

【交通运输与经济】

# 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 ——基于三个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谢兴龙<sup>1,2</sup>, 师萍<sup>1</sup>, 李晓峰<sup>2</sup>, 潘胜利<sup>2</sup>

(1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2 西安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 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 考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实证结果表明, 印度的吸收能力最好, 巴西最差, 中国位于二者之间。流入印度的FDI只有中国的1/13.8, 是巴西的1/3.4。但其经济增长率达到55%, 大大高于巴西, 较好的吸收能力是其重要原因。此外, 不同类型的FDI对这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不同的作用。中国吸收的FDI是资本密集型, 技术含量不是很高, 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很明显; 巴西的FDI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并购, 这样FDI增加了现有的资产, 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 对增长的贡献不大; 流入印度的FDI是技术密集型, 集中在信息领域, 但其规模较小, 对经济整体影响并不突出。由此认为, 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只有培养出卓越的人力资本, 增加吸收能力, 提高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 才能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经济学; 经济增长; 经济转型; 吸收能力; 外国直接投资; 投资

中图分类号: K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5)04-0039-07

## Correlation degree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 ——Based on comparison of three economic transitional countries

XIE Xing-long<sup>1,2</sup>, SHI Ping<sup>1</sup>, LI Xiao-feng<sup>2</sup>, PAN Sheng-li<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mploys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s that FDI has made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ree transitional economie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finding out that in China FDI make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second in India, and last in Brazil. The empirical evidence discovers that India is the best in absorptive ability for FDI, next is China and last is Brazil. FDI flowing into India is only 1/13.8 of that in China, 1/3.4 of that in Brazil, but the growth rat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Brazil, topping at 55% (85% in Chinese mainland). This fully shows the fine absorptiveness in India. In addition, different type of FDI have performed different function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n China most FDIs are capital-intensified, lack of highly sophisticated modern technology. In Brazil FDI is mainly from merging and acquisition, and it increases current assets but can not transform it into productivity. FDI in India is technologically intensified and concentrates on information sector,

收稿日期: 2005-05-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473073)

作者简介: 谢兴龙(1968-), 男, 四川彭州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西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国际经济研究。

but due to its small scale it's effect on economy on the whole is not obvious. At last, only through good cultivation of humen capitals, a rapid increase of absorp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the three countries with transitional economy can enjoy FDI externalities and spillovers of FDL to promot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nomics; economic growth; transitional economy; absorptive capacity;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vestment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FDI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吸引 FDI 最多的国家有中国、巴西和印度。就这 3 个国家的情况而言, 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展较快, 其次是巴西, 最后是印度。从 1986 年开始, 流入中国的 FDI 超过巴西,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流入印度的 FDI 一直在增加, 但绝对数量远远低于中国和巴西。从 2001 年到 2003 年的 3 年间, 流入印度的 FDI 仅相当于中国的 1/13 8, 相当于巴西的 1/3 4。

一、FDI 的外部性、技术溢出和经济增长

布洛姆斯特罗姆(Blomstorm, 1992)认为, 外部性是东道国从 FDI 中享受到的好处, 是跨国公司的一种外部效应。跨国公司利用 FDI 促进东道国的技术和生产力进步, 最终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通过外部性, FDI 给东道国带来技术、知识和资本, 打破低储蓄、低增长、低投资的经济怪圈, 促进经济增长, 增强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FDI 流入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在于技术溢出效应, 通过溢出效应帮助东道国国民经济走上内生化的道路<sup>[1]</sup>。跨国公司的外部性和技术溢出是一种机制, 通过这种机制, 本地公司可以获得发达的生产力, 这样就会导致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一) FDI 的外部性和技术溢出

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创造者, 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会给东道国带来外部经济, 即技术溢出。技术溢出分为技术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 水平溢出是由于同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学习而产生的。市场上每一家公司引进吸收或自己创造一套新技术, 其他相关企业就会向创新企业学习, 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技术, 或者有些企业就直接复制该技术,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相关市场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会体现这种技术, 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就会得到提升。当这些供应商和经销商将这些技术运

用到其他产品和服务上时, 垂直溢出就产生了<sup>[2]</sup>。

归纳起来, FDI 主要通过 4 种途径向东道国溢出技术。

- (1) FDI 带来新技术和新设备。
- (2) FDI 通过东道国的产业关联发生溢出效应。
- (3) FDI 通过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人员培训溢出技术。
- (4) 通过 FDI 企业示范溢出技术。

(二) 新增长理论对“溢出效应”的阐释

新增长理论的一个中心命题: 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 经济可以不依赖外部力量的推动就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新增长理论假定资本及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是收益递减的, 而是收益递增的, 技术进步来自于资本的累积, 技术进步又加快了资本积累, 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自增强机制”。

阿罗(A rrow, 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也就是说, 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 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 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阿罗将技术进步看成由经济系统(这里指投资)决定的内生变量。

罗默(Romer, 1986)认为投资促进知识积累, 知识又刺激投资, 对知识投资持续增长可以永久地提高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卢卡斯(Lucars, 1988)将经济学家舒尔茨(Shercz, 1989)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 对一般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的、特殊的人力资本作了区分, 提出了“私人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经济增长”的卢卡斯模式, 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巴罗(Barrow, 1991)等经济学家将卢卡斯的理论进一步发展, 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己的收益递增, 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的收益递增, 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 阐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

归纳起来,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人力资本

内生性,强调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这不仅被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所证实,而且也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所验证<sup>[3]</sup>。

总之,这一类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产生于对人力资本和科学研究的投资,这种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产生递增的规模收益,从而导致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而它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通过对人力资本、科学的投资和对生产知识的部门、个人提供刺激,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新贸易理论中的“溢出效应”

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两个,其中一个“干中学”,“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

科高(Kokko,1992)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其二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主要取决于外国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其相互影响。前者与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后者与此不相关。

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Wang & Blomstrom,1992)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决策行为对溢出的影响。理论上,无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就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可见,除了原有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着一种取决于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投资决策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具有正反馈性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将创新活动内生化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长期增长不仅受技术变化的影响,而且也受制度和国家特有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可以通过政策优化吸收国的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诱发产量的长期增长。这样,吸收国的经济贸易政策,生产力的提高,立法、政治的稳定性,国际收支和国内市场的大小都对FDI的流入产生影响。FDI通过加剧竞争,改变竞争性产业结构,从而会产生对当地产品的需求,并且强化产业供给<sup>[4]</sup>。

二、经济增长与 FDI 的关联性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借

助 SPSS 计算软件,研究经济增长和 FDI 的关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 UNCTAD。

(一)模型和方法

为了考察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相关性。

建立回归方程:

$$y = \alpha_0 + \alpha_1 x + \epsilon \tag{1}$$

$$g = \alpha_0 + \alpha_1 \text{FDI} + \epsilon \tag{2}$$

$$g = \alpha_0 + \alpha_1 \text{FDI/ASF} + \epsilon \tag{3}$$

式中:Y 为 GDP; x 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总量; g 为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表示经济增长; FDI 取人均的实际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表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 FDI/ASF 为实际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值,是 FDI 的一个代理变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

利用 1980 年到 2003 年(24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表 1)。

表 1 经济增长与流入 FDI 的关系

名称	变量	中国	印度	巴西
模型(1)	x 系数	0.949	0.929	0.642
	t 值	(14.362)	(11.788)	(3.750)
	常数	215.499.4	235.057.7	351.423.4
	t 值	(6.153)	(21.095)	(8.933)
	调整的 R <sup>2</sup>	0.900	0.863	0.390
	F 值	206.262	138.951	14.060
模型(2)	FDE 系数	0.915	0.687	0.667
	t 值	(10.636)	(4.429)	(4.197)
	常数	5.451	5.858	7.090
	t 值	(73.282)	(85.463)	(41.693)
	调整的 R <sup>2</sup>	0.830	0.447	0.419
模型(3)	F 值	113.121	19.613	17.614
	FDE/ASF 系数	0.801	0.671	0.458
	t 值	(6.281)	(4.242)	(2.420)
	常数	5.346	5.456	7.567
	t 值	(41.131)	(63.645)	(69.317)
	调整的 R <sup>2</sup>	0.626	0.425	0.174
	F 值	39.454	17.998	5.854

上述 3 个模型分别用不同的数值测量 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模型(1)使用 FDI 的流入量作为解释变量,考察 FDI 与 GDP 的关系;模型(2)和(3)分别使用 FDI 的人均值的自然对数和 FDI 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值作为自变量,人均的 GDP 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 FDI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3 个模型表示的线性关系显著,  $R^2$  都大于 0.1642。而且,在这 3 个模型中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t$  值都大于 2.074。模型结果显示: FDI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3 个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49、0.915 和 0.801 (平均值为 0.888),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呈很强的正相关;印度次之,相关系数为 0.929、0.687 和 0.671(平均值为 0.762),FDI 与经济增长的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度低于中国;最后是巴西 0.642、0.667 和 0.458(平均值为 0.589),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强。所以,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由强到弱的顺序是中国、印度、巴西。FD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 3 个国家中表现出不平衡性。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了研究 FDI 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以 GDP 为自变量,FDI 为因变量,建立模型(4)和(5)

$$FDI = \alpha_0 + \alpha_2GDP + \epsilon \tag{4}$$

$$FDI = \alpha_0 + \alpha_1GDP + \epsilon \tag{5}$$

对于模型(4),用 FDI 和 GDP 的总量进行回归;对于模型(5),用人均的 FDI 和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进行,1980 年到 2003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所有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 UNCTAD,结果见表 2。

表 2 FDI 与 GDP 的关系

名称	变量	中国	印度	巴西
模型(4)	GDP 系数	0.946	0.929	0.624
	$t$ 值	(13.731)	(11.788)	(3.750)
	常数	-9.027.199	-2.727.165	-7.171.055
	$t$ 值	(-3.482.0)	(-7.703)	(-1.610)
	调整的 $R^2$	0.891	0.857	0.362
	$F$ 值	188.543	138.951	14.064
模型(5)	人均 GDP 系数	0.915	0.687	0.667
	$t$ 值	(10.636)	(4.429)	(4.197)
	常数	-14.716	-19.570	-12.880
	$t$ 值	(-9.458)	(-4.661)	(-3.397)
	调整的 $R^2$	0.830	0.447	0.419
	$F$ 值	113.121	19.613	17.614

把 GDP 作为自变量,FDI 作为因变量,无论采用 FDI 总量回归还是人均的自然对数进行回归,结论是中国的 GDP 对吸引 FDI 的作用最大,相关系数为 0.946 和 0.915,巴西的 GDP 对吸引 FDI 的作用最小,相关系数为 0.624 和 0.667;印度居中,相关系数分别为 0.929 和 0.687。GDP 反应了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GDP 值越大,说明经济

发展状况越好。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是吸引 FDI 的重要因素。中国近 20 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 FDI。尤其是最近几年连续位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成为资本输入的大国。巴西国内经济不稳定,两次发生金融危机,外债负担过重,宏观经济情况恶化,所以从 2000 年到 2003 年的 4 年间 FDI 流入量减少。2003 年以后,宏观经济状况有所好转,FDI 的流入又慢慢回升。印度改革的起步比中国晚,关税比中国高,对 FDI 的限制比中国多,经济总量低于中国,GDP 增长率为 5.6%左右,吸引的 FDI 总量少于中国和巴西。

在这 3 个国家中,中国吸引 FDI 最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那么,FDI 越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吗?换句话说,FDI 越多,其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就越明显吗?答案是否定的。

三、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经济增长

跨国公司外部性的实现会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当地的外部状况,比如教育水平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 FDI 作用发挥方面起重要作用。FDI 是否成为技术转移和高增长的有力工具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有专家认为,FDI 通过技术提高生产力以及资本积累,从而增加产量。有研究人员已经发现 FDI 和资本组合之间存在正相关。另外一些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区位要素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人力资本的水平 and 基础设施),才能把 FDI 的好处内在化<sup>[2]</sup>。既然东道国技术能力很可能决定溢出的程度,那么 FDI 对增长的影响就被局限在这些国家,即劳动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这些国家。此外,也有人认为,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需要一定水平的人力资源。

同样,另外一些人认为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对特定的国家而言,在自由贸易和教育发达的国家里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要追溯到东道国对技术的吸收能力。成功的技术转移不仅需要转移者的积极参与,而且需要被转移者具备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FDI 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这种能力。也就是说,跨国公司技术的溢出效应对增长的贡献的实现取决于东道国的机构、公司和个人对技术的吸收能力。

(一)吸收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

为了研究吸收能力的作用和影响,建立模型(6)

$$g = \alpha_0 + \alpha_1ef + \epsilon \tag{6}$$

式中: $ef$ 为吸收能力,它被定义为FDI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和受过中等教育劳动力的比例的乘积,反应了FDI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sup>[5]</sup>;  $g$ 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示经济增长。

利用1980年到2003年(2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吸收能力和增长的关系

名称	变量	中国	印度	巴西
模型(6)	$ef$ 系数	0.666	0.671	0.440
	$t$ 值	(4.187)	(4.242)	(2.299)
	常数	5.753	5.456	7.584
	$t$ 值	(49.692)	(63.645)	(70.691)
	调整的 $R^2$	0.418	0.425	0.157
	$F$ 值	17.530	17.998	5.283

对于巴西,模型的线性关系不显著, $R^2$ 小于0.1642。对于其他两个国家,模型的线型关系显著。吸收能力对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从大到小的顺序是印度、中国和巴西,相关系数分别为0.671、0.666和0.440。从FDI的总量上看,流入印度的FDI不及中国的1/10,但年经济增长速度为5.5%(中国为8.5%),说明印度对FDI的消化吸收比中国好。流入巴西的FDI比印度多,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比印度小。表明巴西没有充分吸收消化FDI,FDI在巴西没有完全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印度科技人员数量占世界第三位。所以,对FDI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流入印度的FDI只有中国的1/16.9,巴西的1/6.7,但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5%。较强的吸收能力很好地解释了印度在低的FDI流入的情况下,GDP的增长率却高达5.5%。

模型(6)说明FDI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就越高,FDI的外溢效应就越能发挥出来,从而相同数量的FDI对增长促进作用就越大。其实,从广义的角度上讲,不仅是人力资本,而且技术设施、制度环境、经济运行环境等因素也是制约FDI充分发挥作用的门槛。

(二)吸收能力和经济增长

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吸收能力包括寻找和选择适当技术的能力、经济机构或个人把资源整合到生产链中去的能力以及预测潜在的和相关的技术路线的能力。东道国或公司必须拥有吸收、内部化和使

用潜在的可获得的知识的能力。经济单元(国家或个人)的吸收能力对应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的供给,这种能力吸收创造新技术,然后有效使用生产资源。对于国家和公司而言,这种能力的开发和升级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增长。吸收能力对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它使国内经济机构或个人把别的地方的知识内部化。

由于吸收能力的不同,那么FDI好处的本质、水平和程度就不同。吸收能力的差距是总体水平的体现,同时又是从FDI中获得外部性的条件。其根源在于技术发展是一个模仿、吸收和学习的过程。吸收能力是解释FDI效用不同的重要变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技术差异太大以至于在该地区不大可能应用技术和扩散技术<sup>[6]</sup>,那么,FDI的作用就相当有限。

东道国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科研基础设施是决定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东道国应该拥有最低的知识储备,使它吸收跨国公司的外部性。知识储备需要制度和经济实践者,他们决定了某个区域的知识存量,决定了市场和制度的有效使用。因此,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是一个国家增加吸收能力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讲,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增加与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紧密结合。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它与当地企业建立后向关联的难度就越大,这样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只能形成一种“孤岛经济”<sup>[7]</sup>,那么当地企业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技术溢出就越少。

此外,有关研究表明国外直接投资确实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这种贡献是国外直接投资与当地人力资本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技术溢出,东道国必须有吸收能力。巴西的技术吸收能力就较弱,人力资本也很欠缺,从而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不甚明显,印度表现出对技术的较强的消化能力,印度软件产业的成功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在消化吸收FDI技术方面不是很理想,有关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是很明显。虽然印度吸引外资没有中国和巴西多,但印度仍能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说明印度对外资的利用率大大高于中国和巴西。与印度相比,在中国和巴西的外国投资有不少被浪费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巴西的吸收能力不如印度。

综合上述,吸收能力是解释FDI发挥作用的关

键因素。中国、印度、巴西 3 个国家不同的吸收能力折射出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程度的差异。此外,3 个国家 FDI 的来源及其类型也对各自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 四、FDI 的来源及类型和经济增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认为 FDI 是解释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对引进外资和技术转移的关系上,胡祖六认为 FDI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技术转移,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他认为,重要的是 FDI 带来的全新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至于技术,不论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只要有技术的进步,FDI 带来的这种技术转移就是有价值的。确实,FDI 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商业模式和全新的观念,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 GDP 以 8.5% 左右的速度增长,FDI 的作用功不可抹。但中国经济运行质量欠佳,增长效率不高。

据有关方面调查统计,中国每万元 GDP 的能源消耗是美国的 3 倍,是日本的 9 倍;钢材消耗是美国的 5 到 8 倍,是日本的 2.7 倍<sup>[1]</sup>。就吸引的 FDI 而言,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东亚。流入的 FDI 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追求廉价的劳动与资源成本为首要目的,这样的企业不太可能具有很先进的管理知识与经验,或者愿意将那些拥有先进知识和经验的管理人才派往中国<sup>[8]</sup>,这样,技术和管理的先进性就有水分。

此外,FDI 产业分布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含量不够高。2003 年,第一产业实际使用外资所占的比例仅为 1.9%,而第二产业中比例为 74.2%,第三产业为 23.9%。第二产业中的 FDI 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商业、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利润较高的行业。2003 年这几个行业在第三产业中实际利用外资所占的比重为 64.91%,而流向交通运输、地质勘探和科教文卫等公共部门的就较少。外商直接投资中 70% 以上是以设备原材料作为资本投入的,在部分行业,外商的确转让了很多技术,但对核心技术进行封锁。所以,这些外国直接投资对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的帮助不是很大。因此,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并非有人宣扬的那么神奇。但总的说来,FDI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印度的 FDI 主要有两种形式,跨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外国投资者与本地投资者的合资企业。毛

里求斯是印度的重要投资者,其次是美欧、日本和韩国。从投资额来讲,合资企业占的比例更大,主要投资于电力(3%)、IT 服务(20%)、软件业(13%),也投资于汽车和金融服务(各占 5%)。跨国公司的独资企业分布在各个行业,除了电力、IT 和软件之外,包括石油、电子和制药等其他服务业。

总而言之,印度的 FDI 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软件、服务(尤其是 IT)和技术上具有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印度的 FDI 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导向,只有独资企业 9% 的投资额和合资企业 4% 的投资额是出口导向的。所以,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技能密集型。因此,流入印度的 FDI 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印度吸引外资的规模不大,只相当于中国的 5.9% 以及巴西的 14.9%。FDI 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有限。所以,印度的问题是怎样扩大引资规模。

流入巴西的 FDI 主要来自欧美,西班牙是巴西目前的最大投资者。西班牙在巴西的投资重点是电信、金融、电力和因特网等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行业,其中在电信业的投资最多,占西班牙在巴西投资总额的 43%,在金融和电力部门的投资分别占 32% 和 16%。

1995 年以前,FDI 主要投资制造业,例如,汽车制造、化工、食品、电子材料、通讯产品、办公设备、信息技术和非金属矿。在以后的几年里,FDI 集中在服务部门,例如电力、水汽、邮电和通讯、金融、批发、零售。到 1995 年为止,第一产业吸引 1.6% 的 FDI,第二产业(制造业)吸引的 FDI 占 55%,第三产业(服务业)吸引 FDI 占 43.4%;从 1995 年到 1999 年,流入第一产业的 FDI 的百分比为 1.5%,流入第二产业的 FDI 的百分比为 18.4%,流入第三产业的 FDI 的百分比为 80.1%。1999 年开始,巴西加速了私有化进程,FDI 更多流向服务行业。在巴西由于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进程加快,大量破产的公共和私有金融机构以及国有公司销售给外国公司,这是 FDI 增加的主要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 FDI 没能转化为经济增长,因为大部分没有产生出新的生产力,仅仅是获得现有的资产。根据科德纳夫斯诺基(Chudnovsky, 2001)的观点,巴西有 4 种类型的外国子公司。一小部分子公司(获取资源或在工业中进行投资大量使用资源的公司)是自然资源寻求型。它们的贸易余额对于产生盈余具有结构性的负面影响。另外 3 种类型的子公司大部分是市场寻求性。它们进口

大量的制造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只出口小部分产品,因此进出口贸易是逆差。在开放经济里(价值高的当地货币)这些外国公司导致进口的增加,而没有带来出口的增加。结果,贸易的增加和支付的不均衡使得经济增长缓慢。因此,低的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外生障碍,而是贸易余额的逆差和经常性账户的赤字<sup>[9]</sup>。

## 五、结 语

从数量上看,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最大,其次是印度,最后是巴西。流入巴西的FDI数量远远高于印度,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印度小。FDI的来源及其类型也对各自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

在3个国家中,流入印度的FDI是技术密集型,但规模不大,从数量上看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如中国。中国吸引的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技术含量成分不够高,技术溢出效应不够明显,所以FDI对经济的作用并非想象的那样理想。流入巴西的FDI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对增长的作用较小。印度对FDI的吸收能力好于中国和巴西,巴西的吸收能力最差。吸收能力差是FDI对巴西经济增长作用小的重要原因。从而溢出效应在巴西大打折扣。这里建议中、印、巴三国实施以下策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力,为技术溢出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本。

在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中,中国给予了外国投资者很多好处,比如税收优惠。其实,给予FDI的优惠政策最合理的程度应该是能够产生溢出效应的程度。所以,是否产生溢出效应应该成为评判FDI作用和功能的标准。

对中国而言,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应当通过相关法律和政策,实现从“数量引资”向“技术引资”的转变,全面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

对于印度而言,它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有很多优势。比如说,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其法律体系非常完善,而且与欧美国家的法律体系兼容性更好;作为WTO的成员国,各种经济商务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已经多年,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之一,对西方投资者不存在语言障碍等。因此,建议印度做到以下几点:除了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以

外,印度应加快工业化速度,降低关税,改善基础设施,制定优惠的政策和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只有这样,印度才能够扩大FDI规模,从而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

巴西应该建立稳定的金融环境,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实现经济自由化,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吸引高技术含量的FDI,提高对FDI的消化吸收能力,这样才能实现FDI的外部性和获得技术的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面对外资纷至沓来的趋势,3个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用外资解决自己国家问题的局限性和最大边界。一国的经济完成原始积累后,面临着从总量推动增长方式向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虽然可以从跨国公司在本土的投资中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但无论技术溢出效应大到什么程度,不可能从溢出效应中获得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所以,3个国家都必须提高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增加对FDI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从而增加国民经济的内生性。

## 参考文献:

- [1] 孟亮.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J].国外经济与管理,2004,(6):26—29.
- [2] 唐正康.国内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5—31.
- [3] 刘玉珂.经济增长模式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 [4] Johan Ericsson. On the causality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put[J].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01, (1): 2—5.
- [5] 王志鹏,王子奈.外商直接投资与内生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文汇,2004,(3):28—29.
- [6] 杨先明.国际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7] 唐正康,廖克平.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限制因素分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3,(8):85—86.
- [8] 袁诚,陆挺.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5,(3):78—80.
- [9] Glauco Arbix, Mariano Laplane. Stagn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J]. Competition & Change, 2003, (7): 119—121.